

贾平凹 研究

主编 李伯钧 副主编 陈兆朋

执行主编 吴文莉

西安作家作品创作研究丛书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J
I
A
P
I
N
G
W
A
Y
A
N
J
I
U

西安作家作品创作研究丛书

贾平凹研究

主 编 李伯钧

副 主 编 陈兆朋

执行主编 吴文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图书代号: WX14N033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贾平凹研究/李伯钧主编.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总社有限公司, 2014. 7

(西安作家作品创作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613 - 7781 - 9

I. ①贾… II. ①李… III. ①贾平凹—文学研究—
文集 IV. ①I206. 7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7494号

贾平凹研究

李伯钧 主编

责任编辑 刘东风 杜莎莎 杨继顺

责任校对 梁 菲

装帧设计 屈 昊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8

插 页 1

字 数 372千

版 次 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613 - 7781 - 9

定 价 68.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85303879

“西安作家作品创作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编

李伯钧

副主编

陈兆朋

执行主编

吴文莉

编辑

孙 华 方忠民 赵建鹏 马 莉

目 录

- 001 他能穿过“废都”，如佛一样
——贾平凹创作历程论略 / 陈晓明
- 070 庄之蝶论 / 李敬泽
- 083 心灵的挣扎
——《废都》辨析与批判 / 雷达
- 095 论贾平凹 / 马原
- 097 古朴审美理想的孤独守望者
——论庄之蝶 / 李锐
- 107 废都里的秦腔 / 王德威
- 118 “说话”与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文体美学
——从《废都》到《带灯》 / 李遇春
- 144 论《秦腔》的现实主义艺术 / 陈思和
- 164 再论《秦腔》：文化传统的衰落与重返民间 / 陈思和
- 176 从《带灯》看“法自然的现实主义”叙事艺术 / 陈思和
- 191 贾平凹小说的叙事伦理 / 谢有顺
- 215 日常叙事中的悲悯情怀
——评贾平凹长篇小说《古炉》 / 王春林
- 250 “贴地”与“飞翔”
——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 / 吴义勤
- 257 论《带灯》及贾平凹中国式文学叙事 / 韩鲁华
- 286 从“未庄”到“古炉村” / 孙郁

295	镜灯天地水火 ——贾平凹《带灯》及其他 / 程德培
327	坚硬的现实，优雅的超越 ——读贾平凹长篇新作《带灯》 / 李星
340	评贾平凹的《带灯》及其他 / 陈众议
358	贾平凹散文集《月迹》序 / 孙犁
361	生命审美化 ——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 / 费秉勋
372	文学天空中的恒星 / 杨乐生
378	巍然矗立的艺术山岳 ——再谈贾平凹的文学意义 / 李星
391	《秦腔》：乡土中国叙事终结的杰出文本 ——北京《秦腔》研讨会发言摘要
401	悲悯的情怀，落地的文本 ——贾平凹《古炉》北京研讨会发言摘要
413	专家学者评贾平凹之《废都》
429	贾平凹作品出版年表
438	贾平凹研究专著

他能穿过“废都”，如佛一样

——贾平凹创作历程论略

陈晓明

现代汉语白话文学历经百年的风吹雨打，终于成长挺立几棵大树，贾平凹无疑傲然在列。不管是作品的数量还是质量，不管是对当代现实的表现，还是对西北地域文化的表现，不管是他笔下众多鲜活灵动的人物，还是独具韵味的文字风格，贾平凹都无可争议是当代最卓越的作家之一。历经30多年的创作，他的作品涵盖了一部当代中国文学变革史，他笔力所及无疑是当代文学抵达的境地，他的困扰与艰难，无疑也是当代中国文学的困境，深入解读贾平凹的创作历程，细读他的作品，也是在解开中国当代文学的地形图。他身上显现出来的文学意蕴如此丰厚，汇集的问题、矛盾与启示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如果不认真对待贾平凹的创作，就不能脚踏在当代中国汉语言文学的坚实的土地上。

毋庸讳言，在贾平凹的创作历程中，《废都》是其重要的起轴心作用的作品，这不只是在于它曾经产生过激烈的社会影响，更重要的在于它标示着90年代中国文学重新开始的独特的戏剧性形式。而贾平凹本人的创作抵达于此，本来是预示着他创作风格和小说美学观念的转变，却遭遇历史化的戏剧性冲突，他本人也放弃了这一方位的转向，而转向更具有现实性的创作。贾平凹抵达这一“废都”不仅仅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他要写出上世纪90年代之初，中国社会现实

的困扰、虚空与茫然；同时具有深远的历史感——要在文化上和美学上试图沟通古典时代的血脉。然而，他要穿越“废都”的方式却是选择了颓废美学，在这废都的旷野上，前有古人，后无来者，只有他只身一人去迎接降临的“古典美文”，谁能理解这样古怪的超前举动呢？90年代初，中国知识分子重新出场就遭遇到这一片废都，如此空无一人的历史空场，只有一个自以为旷达的贾平凹，他不幸就成为重拾批判性大旗的知识分子集体行动的牺牲品。二者本来相距甚远，不幸狭路相逢，历史将错就错，而贾平凹也只有将错就错。“废都”这一方天地，不再是他经营古典美学的理想家园，而是他要辞别的故土旧地。贾平凹转向《秦腔》，又有《古炉》，还有《带灯》，这就可以更清晰地看到《废都》起到的轴心作用了。贾平凹没有“在废都”里被击垮，而是站立起来，重新出发，不断成就自己，有了一种更加沉静笃定的写作状态。这就可以去梳理贾平凹抵达《废都》的曲折的过程，他转向走出的一条更加险峻的路径。这一路径，无疑也折射出当代中国文学的隐秘路径。

贾平凹的创作量是如此丰富，我们当然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全面展开。这里就以《废都》为某种转折点选取他不同阶段的有代表性的文本加以讨论，勾画贾平凹创作的变化路线，由此也归结出他对汉语文学的贡献。

一、发乎西北地域文化的“性情”

如果说到汉语小说的本土性或民族特色，贾平凹无疑是这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本土性或民族性在文学价值评价方面是一把双刃剑，夸大它的作用，则把自己区隔于传统封闭的领地；完全无视它的存在，也不能显示出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文学贡献。当然，我们会说，文学就是文学，所谓的本土性或民族特色也只能是在文学性构成的整体中去认识，也就是说，既

要在西方已经形成的文学审美价值体系里去认识它，同时又要在相互参照中去看到它所体现的汉语文学的独特性。

大多数本土性或乡土性都经不住这样的双重解析。只有贾平凹经得住这样的考验，尽管他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迷惑。贾平凹素有“鬼才”之称，他的小说文章，看似平淡自然，实则诡异奇崛，鬼斧神工。其缘由大抵在于他的作品总是有着独异的文化底蕴，他的文字总是可以引领人们进入不同寻常的地界。

梳理贾平凹的写作史是困难的，他的作品数量如此庞大，尤其是他的出色之作如此之多，当代中国作家几乎无人可与之比肩。1952年出生的贾平凹在21岁那年发表了可能是他的第一篇小说《一双袜子》，该作发表在一份地方刊物《群众艺术》上，手笔很是稚拙。1978年发表《满月儿》获得当年全国首届短篇小说奖，这在当时是一件颇不寻常的事。此后数年，贾平凹作品甚多，但无惊人之处。直到1983年以后，贾平凹连续发表《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再录》《鸡窝洼的人家》《黑氏》《远山野情》《天狗》《人极》等作品，他找到了自己写作的根基与路数。“寻根”给他提供了历史契机，他的古旧而无多少时代气息的“商州”地域文化突然间有了时代的依据。那些“山野风情”，以实录笔法，寻常道来，游龙走丝，下笔成形，倒是别具一格。那时的文坛，为“本土文化”所困，都竭尽全力，去寻民族的生存之根。有寻“优根”者，有寻“劣根”者，以期响应于“世界范围”内的文化认同和国内学界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诘难。当然，归根结底是对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做一番文化上的通盘考虑。80年代中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当然包括作家）擅长做这些宏观雄伟的思虑，纵横古今，坐而论道，以天下为己任，文学当然也是经国之大业。贾平凹偏居西北，有地利之便。那时他沉下心来查录18本商州地方志，发现商州历史悠久，出过“乌骓马”，有“追风逐日”之神力……“寻根”让贾平凹有了底气，他这才看清自己

的天然优势，告示世人，何以不管商州地理内情？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有这些“文化”垫底，商州地界的寻常琐事，自然浸含文化的原汁原味。他的那些“地缘文化”占据有利地形，可以出奇制胜，比人技高一筹。

实际上，现在看起来，贾平凹比那时的“寻根派”要更高明得多，他并不把文化当作全部，文化只是他的一个原料，一个背景，他依然没有忘却/丢弃新时期的“文学是人学”的人性论宗旨。所以，在我看来，贾平凹并不是扎根本土，而是穿过本土——本土不是他困囿其中的一方地盘，而是他任意穿行的广大。他的小说一开始就奔“性情”而去，他要在性情中流露出民俗风习，要在风土人情中展现出人性。贾平凹一开始就没有让历史断裂，没有在文化寻根与新时期的文学的人性论之间划下沟壑，只有他弥合了两个时期却没有沦为落伍者。这就是贾平凹，既偏执顽强，又聪明过人。有文化做底蕴，原来被认定为封建落后、野史传闻，乃至迷信谶纬的那些现象，现在已经没有进步尺度作为压制，贾平凹借助地理风情，下功夫去发掘那种文化状态中人们的心灵美德、高尚情操，同时细致刻画那些偏离道德规范的野情私恋。要强调正面道德化的意义，那就必须在强调道德的纲领下来进行。贾平凹一开始就精通写作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使他的写作在“性情”中游刃有余，它在常规化的边界撕扯开一道裂罅，那里洋溢着无尽的秦地文化意味。

贾平凹那时的作品，都是在地域文化的氛围下充分表现男女性情。天狗（《天狗》中的人物）36岁尚未娶妻成家，对师母情有所钟而想入非非。不想师傅中途遇难，瘫痪在床，师傅做主让天狗和师母结合，而天狗勇敢承担起照顾一家人的义务，却并不完成多年的夙愿。在对性的努力压制中，细致委婉地展示了性的意识和各种心理，同时道德升华也得到充分完善的表现。师傅以自杀成全了天狗和师母，又一次给性情的细致表现提示了道德高尚的背景。

《逛山》中的那个柳子言，则充分表现了性情的话语如何向

着怪诞一方发展。这个年轻英俊的风水先生类似古代民间知识分子。他对四姨太一见钟情，想入非非，却没有行动，与其说他怯懦，不如说他更偏爱于细细品味。他行动无力、愚蠢，甚至被人打断一条腿，他唯一一次挺身而出却又被下人愚弄。小说正是在这样的情境中，对人物的心理展开细致而美妙的描写。他对性诱惑的逃避，恰恰给性诱惑的细致展示提供了充分的前提条件。这个柳子言期待诱惑又逃避诱惑，由此既展示了“山野风情”那些超越文明生活规范的性场景，又蒙上了一层温馨而感伤的面纱。这些关于性情的故事，又由于地缘文化转而变成对“人性”的探索思考。现在人性的解放尺度不再需要寄寓于思想解放，而是回到文化就可以有更为本真的人性自然流露。

这种“性情”总是打上了风土人情的烙印，以至于贾平凹要把它们推向更具地域传奇才能显示出其独特意味。《五魁》可以看成贾平凹早年最有西北韵味的小説。那个五魁从16岁开始干背新娘的活计，这使年纪轻轻的五魁过早地陷入了性体验的焦虑中。遭土匪抢劫却为能与新娘相拥为伴而感到庆幸，捏一双女人的小脚“浑身的血管就汩汩跳”。美丽风情的少奶奶不想却是“白虎星”，这个文化符号在小说叙事中，却是起到极重要的作用。文化的特异代码印在女性的身体上，它是性的漫长的习俗，决定了女性的命运，暗含着叙述人的同情，却又无可挽回地具有宿命的指向。这样一个性的特异代码贯穿故事的源头和各个关节。在后来的岁月里，五魁在柳家大院扛活，为的是能体味少奶奶的音容笑貌。与对女性温情脉脉的幻想相平行的虐待女人的叙事也在展开，它映衬了五魁对少奶奶向往的美好和精神之高尚。终至于五魁救出女人，在山野同居。然而，面对这性诱惑道德感却又油然而生，一个血性男子对活生生的心爱的女人退避三舍。在道德上成全五魁是必要的，压抑五魁，释放女性的欲望想象，贾平凹的小说叙事可谓无比高明。少奶奶这个本是追求自由与生命自主的女人却压制不住如火的性欲，偷偷在干着与狗交媾的勾当，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

当然击碎了五魁的道德感，女人也以身殉情（还是殉德？）。贾平凹的性情在追寻“文化”的道路上，这一次走向了极端，他借助了民间性传说的怪异和邪狎，似乎非如此不能有文化。在现代文明的普遍规则之下，文化是什么？文化的极限处就是那些神奇的性习俗，它们就是现代之外的异端或不可理喻的他者，这是被现代性普遍经验删除的所谓的文明“落后”“陋习”“异俗”等等，贾平凹怀着热情从文明的边缘打捞出来，让我们重新审视在现代之外的人们的生存状况。

这就不难理解，贾平凹一直在写和要写出的实际上就是“性情”二字，特别是处在秦地文化区域里的人们。这种“性情”以地域文化为依托才能表现得淋漓尽致，如果脱离了这种地域文化，贾平凹的性情必然单薄；同样，如果离开了性情，贾平凹的文化就没有血肉。而通过二者的融合，贾平凹把新时期关于“人性”和“人道”的叙事推向了极致，只有他不是在意意识形态反思性的语境中讲述人性故事，那是扎根在西北土地上的生命存在，人性与文化获得了超出现实的政治与思想语境的意义。确实，在80年代后期至90年代上半期，中国为现代化所鼓舞，贾平凹仿佛以一个落伍者的姿态，与现代文明进行着不自量力的较量。多少年过去了，人们会惊异于贾平凹的这些表现，为人们遗忘的文明野史留下传奇的记忆。

当然，贾平凹始终有关怀现实的一面，甚至这是他的创作无法释怀的主动意识。1987年《收获》第1期发表贾平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浮躁》，同年9月，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浮躁》写的还是贾平凹的商州文化，或者说是其概括和总结，只是加重了现实关怀，专注于描写贾平凹过去小说并不常见的关于当代农村经济变革的现实问题。小说取名《浮躁》，即是说，小说试图表现那个时期经济变革大潮带来的浮躁风气，人们的行为、心理和价值取向都陷入浮躁之中。就在当时，贾平凹的这部作品无疑具有非同凡响的意义，关注现实而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容量的长篇小说并不多见，贾平凹既抓住农村改革涌

动的大潮，表现农民企图脱困的热切愿望，也揭示出那个时期的社会风气和心理。在倡导现实主义的文学的时期，这是它引起关注的重要标志。然而，事过境迁，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贴现实太紧太近，就成了这部作品局限性的问题所在。其一，用“浮躁”来概括那个时期的改革大潮的涌动，也显得过于简单片面。如果要揭示那个时期的问题，并不是“浮躁”二字可以概括的，“浮躁”充其量也只是表现形式，一些表面现象而已。中国社会在那个时期聚集着多种矛盾，举凡制度、权力与特权腐败、农村的贫困化、改革方向不明确、政策不稳定也不能持续、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等等，都是社会深层次的问题，作家对现实的思考，显然没有在这些更具有症结性的问题上达到深度。其二，文学对现实诊断实在是一件力不从心的事。文学只是以作家的个人敏感去表现现实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文学无疑有政治的和道德的判断，然而不是那种直接的宣告，而是以文学形象说话。如果重提现实主义原则，马克思当年就说过的不应当是席勒式的概念化表达倾向，而应当是莎士比亚式的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流露出来。马克思的经典教诲，恰恰在众多的现实主义写作中被遗忘了。贾平凹这部作品，就是太想直接对现实发言，太想以最简明扼要的概念概括这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这显然背离了贾平凹的创作本色。

《浮躁》发表后不久，熟知贾平凹创作的陕西评论家李星先生就发表评论——《混沌世界中的信念和艺术秩序——〈浮躁〉论片》，他充分肯定了《浮躁》的现实意义：“它比平凹以往的作品更宏阔地反映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也比平凹以往的作品更突出更全面从而也更准确地表现了作家自己的思想和人格。”^①李星看到这部作品存在着反映现实的创作态度与贾平凹以往的创作方法的矛盾，但李星似乎更强调面向现实的意义，他以为贾平凹既想与现实、与人民发生联系，却又感到与他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念有冲突，在强调现实性的意义上，李星

看到贾平凹陷入了矛盾。在我看来，贾平凹小说叙述的现实关怀必然是一种沉着于他的文化追求和审美理念之中的思想意向，在《浮躁》中，这二者无法达成一致。对现实的急切表现占据了主动，那些浮躁的人和事似乎要成为叙述的主导，它们与文化及性情的描写构成相当紧张的冲突。很显然，对现实的过于直接急迫的表现，限制了贾平凹的小说叙事在文化与性情方面的从容发掘。而且正反两方面的二元对立太鲜明，金狗和田中正的斗争，像是两条路线斗争的重演。贾平凹自己似乎也并不十分满意这部作品，他承认写《浮躁》时，自己亦是浮躁的。“浮躁”是一个很表面、很浮浅的词，它既不能概括那个时代的社会矛盾，也不能概括贾平凹这部作品的意义。如果说贾平凹有浮躁的话，那就是他太急于表达他对现实的看法，他过于急切找到一个时代的总体性标识。而这点并不是文学作品可以做得到、做得好的。

抛开这点来看，贾平凹的这部作品还是有它的独特价值所在。不管怎么说，文学对现实的表现还是有其意义的，尤其是当变革构成中国社会的首要特征时。《浮躁》在一定程度上写出了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农村发生的潜移默化的变化，写出了体制的松动，旧秩序的动摇，人心点燃的希望，不屈的挣扎与奋斗……身陷于贫困中的人们，是如何渴望脱贫致富。他们与河流搏斗，为的是获得生存下去的基本保障。也确实有一种改变生活的愿望和情绪在躁动，仙游川、两岔乡、白石寨县，乃至整个商州，都涌动着一股热潮，我们可以感受到社会各阶层都在渴望一种新生活。金狗、福运、雷大空等人，他们凭着一股野性本能去追逐时代的变迁，也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金狗的奋斗也反映了青年一代农民在变革时代的生存渴望。另一方面，小说对权力关系的揭示也相当尖锐。随着历史变革的到来，原有权力关系格局也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可以看到，在中国，权力是怎样深入地掌控着社会，直至乡村的权力运作赤裸裸且蛮横无理。我们也开始看到，改革开放终究有可能瓦解原有的权力体系，至少引起权力的格局改变。

当然，对现实的表现实际只是一个构架，贾平凹真正感兴趣，或者说他得心应手的还是那些人伦性情。小说在“改革”的现实表象下，隐藏着贾平凹过去一直苦心经营的“性情”。这些“性情”弥漫于其中，使得小说的韵味依然十足。因为贾平凹有能力透过现实看到文化和人性，所以他的小说总是以超出现实、不被现实所囿而高人一筹。即便是如此急着要对现实下诊断的作品，贾平凹的文化底蕴依然可以化解现实的直接羁绊，它使《浮躁》不那么“浮躁”。

《浮躁》中的人物既对应现实改革的诉求，同样浸含着文化韵味。这些人物的独异之处在于，他们总是被打上某种文化印记。金狗身世奇特，与众不同，胸前有墨针的“看山狗”图案，这就造就了他日后不安分不寻常的天性。金狗与小水青梅竹马，却迟迟不能表白，结果让英英取得了主动委身于他的机会，一桩美好姻缘就这样变了味，酿成了一系列别别扭扭的恩怨。小水嫁给一个短命鬼，年轻就守寡。写寡妇是贾平凹的拿手好戏，寡妇门前是非多，也意味着故事多。金狗直到后来福运死了才又和小水走在一起，真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绕了一个圈又回去了，但中间的阴差阳错又是小说叙述所必需的，贾平凹需要的“性情”就从这些缝隙间流露出来。贾平凹的性情总是有正反双重含义，它混合着圣洁/欲望、隐忍/放荡、合理/非法等有活力的对立面。其正面的谱系有一系列的人物，其反面也有一系列的人物，有时可以一起混合在某个人物身上。贾平凹的小说也因此能写出人性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他的人物总是在文化规范体系边缘行走，他们时时处于僭越伦理道德的危险境地。金狗和英英、小水、石华几个女人的关系，没有一件是得体的和合乎伦理纲常的。似乎只有非法的反常的情欲关系，还是能显现人的“性情”，才具有复杂的文学意味。恰恰依靠了这些人伦关系的非同寻常的书写，贾平凹的小说才能写出人生的苦涩，写出活生生的人性，写出生活不可摆脱的那种宿命。

写完《浮躁》，贾平凹认识到自己以这种方式来把握现实

吃力不讨好，也失去了自己的艺术特长，所以他一再申明“我再也不可能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他认为这种写实的办法，对自己“并不适宜”，对自己是“一种束缚”。写《浮躁》对于贾平凹是一次修性练笔的手段^②，他似乎更明白自己的艺术道路该往哪个方向伸展了。然而，贾平凹的写作是否真的可以摆脱直接关注现实还值得怀疑，他或许可以透过文化关照现实，但现实却时时侵扰他。

二、《废都》的文化想象与批判性情境

贾平凹有相当一段时间深藏不露，既是隐忍不发，也是潜心修炼。1993年，贾平凹还是突然出现，让文坛猝不及防。贾平凹说想避开现实也许是真，但现实由不得他的意愿。他的作品来到现实中，现实中的人们就会依据现实来读解它的意义。

《废都》这样的书名其实还是与《浮躁》如出一辙，还是在应对现实，还是要对现实宣判诊断。

贾平凹确实抓住了某种历史情绪，他显然是为90年代初的现实所触动而又一次偏离了原来的位置，他试图转过来描写城市中的“知识分子”。平心而论，贾平凹有关切现实的禀赋，90年代初的要害问题之一就是知识分子问题，这是80年代终结的后遗症。90年代初的知识分子不仅茫然无措，也处于失语的困扰中。王朔的调侃替代了知识分子话语真空，但却替代不了知识分子的位置。知识分子还是处在那个尴尬的位置，他们对王朔进行了集体的围攻。知识分子的话语以毫无历史方向感的形式第一次获得了表达，那就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的表达，王朔不幸成为杂语喧哗的对象。失语后的复活没有别的方式，只有强烈的批判性，矫枉必须过正，下一个对象是贾平凹，他显然是一个更合适知识分子重新出场较量的对象。因为贾平凹唤起的是文化的和道德的记忆，道德话语是知识分子最熟悉的

话语，是在他们牙牙学语时就掌握的语言。贾平凹不幸中又是万幸，这样的攻击其实太外在，并没有抓住贾平凹的实质。那时对贾平凹的批判集中于露骨的性描写，而批判者也无法自圆其说。那么多作品都写了性，也露骨得可以，中国古代的就有《金瓶梅》，西方的有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后现代的还有纳博科夫的《洛丽塔》，怎么都成了名著？而贾平凹写性就不能露骨？这不是问题实质。

当然，毋庸讳言，“性”在这部作品中十分醒目突兀。“性情”本来就是贾平凹的突出之处，原来的“性情”与地域文化和山野风情结合在一起，“性情”带着自然的朴实和率真。现在，“性情”突然赤裸裸呈现出来，如此醒目，如此绝对和极端，让人猝不及防。

实际上，这里的“性情”虽然离开了乡土民俗，但还是有另外的背景，那就是民间的文人传统、典籍字画以及野史笔记。这是与原来的山野风情同属一类的民间文化资源，只是比山野风情雅、比正统典籍文化俗的民间文人传统。在精神气质上，它属于有别于儒家正统的道家邪狎一类；在文本形态上，它属于野史笔记禁书一类。贾平凹实际上带着他对当代文化现实和文化遗产的评判来写作《废都》，他要找到超越当代文化溃败的另一种更为本真的“性情”文化，并且在文化的传承脉络中，在90年代浮出地表的传统文化复兴运动中找到根基。这种文化即使在传统的经典化的历史中也是非主流的、被压抑的；正因为此，贾平凹可以设想它更具有人性的本真性。因而它与性情，或者与纯粹的性可以完全重叠在一起。说白了，它就是80年代后期开始兴盛的“性文化”的集大成。这又是对“文化之根”的重新想象，这是他独树一帜另辟蹊径的文化想象。他不仅超越自己的“山野风情”，还有可能是与莫言的“红高粱”燃起的关于生命热力想象的间接对话。相比较而言，贾平凹的文化想象，则是扎根于生命本体，扎根于正在醒觉的肉体中，它不需要对自身的狂野有多少要求，只要身体有